

蒋廷黻 编著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库

湖湘

蒋廷黻 编著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蒋廷黻编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55-5783-4

I. 近… II. 蒋… III. 外交史-史料-中国-近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14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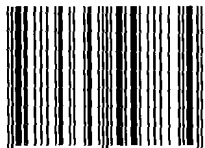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编 著	蒋廷黻
责任编辑	符本清 喻亚中
特约编辑	王 颀
责任校对	龚昊等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地 址	长沙市韶山路443号
印 装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65
字 数	738000
书 号	ISBN 978-7-5355-5783-4/G·5778
定 价	130.00元

ISBN 978-7-5355-5783-4



9 787535 557834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李育民

蒋廷黻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1895年12月7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东乡黄阪桥的一个小康之家。幼年读私塾，因科举废除，旧学无用，家人于1906年将他送到长沙明德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一学期后，又转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语。在这里受到林格尔夫妇的影响，受洗加入基督教。1912年，蒋廷黻只身赴美留学，先入密苏里州派克中学。毕业后于1914年转学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1918年，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返回美国，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海斯教授。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国内。

回国后，蒋廷黻任南开大学教授，执教6年。1929年，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转到该校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九一八”之后，蒋廷黻与胡适等人于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在该刊及其他刊物发表了不少时事评论文章，阐述时局主张。因赞成“先安内而后攘外”，提出“统一”的各种建议，引起了蒋介石

石的注意，由此从学界踏入政界，从历史学家转为外交家。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之后，翌年以“极为信赖”的私人代表身份派他秘密访问苏联。1935年，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1936至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出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任国民党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迄至1965年5月退休。退休后，蒋廷黻拟继续未竟的学术事业，不期因癌症不治，于同年10月在纽约病逝。

- 2 在美国留学期间，蒋廷黻逐渐确立了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方向。初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蒋廷黻有一幼稚的想法，以为如果成为中国报界大亨，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于是选择了新闻学院。很快，他发现，新闻人员对政治的了解是表面的，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于是又改修政治。不旋踵，蒋廷黻又感到，政治学所讲的政治脱离实际，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下手。^①这样，他最后确定以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并对中国外交史极感兴趣。

同时，蒋廷黻受到了西方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以及美国新史学的熏陶。在西方，自实证主义思潮形成之后，这一科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哥伦比亚大学亦非常重视这一方法，在课程设置、论文指导方面，均有史料辨别和使用的内容，蒋廷黻在这里经受了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在此期间，美国的“新史学”处于主流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又是这一学派的中心，导师海斯则是“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宾逊的弟子。该学派打破传

①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6～77页。

统史学的禁锢，提出建立新史学的种种主张，给蒋廷黻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极为重视史料的搜寻、考订和整理，在此基础上打破成见，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一经历。另外，海斯《族国主义论丛》中的思想主张，以及被称为中国外交“标准书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马士著，分别于1910年、1918年出版），均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发对中国外交史的种种思考。

在南开大学6年，蒋廷黻搜集整理外交史资料，坚持不懈，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其后到清华大学，更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继续搜集资料的同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先后《清华学报》、《清华周刊》、《政治学论丛》、《新经济》、《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了《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琦善与鸦片战争》、《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外交史及外交史料》、《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道光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百年的外交》、《再论百年的外交》等论文。著作有：《族国主义论丛》（译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著，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1934年）、《中国近代史》（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年出版，翌年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身后出版的著作有：《蒋廷黻选集》1—6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大西洋图书公司1970年）、《筹办夷务始末补遗》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道光咸丰两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郭廷以主编，台北中英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其中，《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以下简称《辑要》）上、

中两卷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之一，辑录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外交资料。据蒋廷黻的看法，这段时期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应当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此所录均为中国文献。甲午之后的史料，拟另辑为下卷，中外兼收，由于此后转向政界，无暇顾及而未着手。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资料汇编，却反映了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 作为一部资料汇录，该书取材广泛，几乎辑录了所有能够获得的文献。蒋廷黻确定择其信、择其要、择其新三个辑选原则，大约从1926年开始着手编纂，至出版前仍不断搜寻充实新的资料。1930年，深藏故宫博物院多年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影印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外交史档案文献，该书的编纂也因此获得了充分的保障。但是，蒋廷黻并不满足，仍从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文献中检阅抄录，整理爬疏。他每周花一两天时间，不辞辛劳，从清华园赶往清代军机处档案所藏之地北平大高殿，清晨出发，日夕方归，辑录资料近二千件。

最后编纂成书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引用了大量文献，有：《东华续录》、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案、《三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信及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书札）、《李文忠公全书》（奏稿、朋僚函稿、译署函稿、海军函稿）、《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书牍、年谱）、《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录《乘槎笔记》、《初使泰西记》、《使西记程》等）、《中西纪事》、《养知书屋文集》、《沈文肃公政书》、《岑襄勤公奏稿》、《湘绮楼日记》、《涧于集奏议》、《曾惠敏公奏疏》、《刘忠诚公书牋》、《刘武慎公遗书》、《请缨日记》、《语冰阁奏议》、《适可斋记

行》、《庸庵文编》、《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啬翁自订年谱》、《中东战纪本末》，等等。

上述所录文献中，除了已刊和未刊档案文献、资料汇编之外，还包括相关人物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刘坤一、刘长佑、沈葆楨、薛福成、马建忠、斌春、志刚、岑敏英、张佩伦、唐景崧、王闳运、林乐知等人的文集、著述。官方档案记载了清政府折冲樽俎中的思路和对策，以及对外交涉的过程和艰难，其价值不言而喻。而这些人物或为办理交涉的当事者，或为参与外交政策讨论的大吏，或为派往西方的使臣，或为外交建言的官员幕僚，或为记述重要事件的著者，他们留下的文字，亦多为蒋廷黻所说外交史的“原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各种问题，弥补了官方档案的不足，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更为深入、细微的内情。

《辑要》的价值不仅是作为第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资料汇编，提供了选材广泛、内容精要的资料，开启了这一有意义的基础工作的先河，还体现在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搭建了结构较为完备的基本框架。其时，国内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尚在起步之中，此前虽出版过刘彦的《中国近世外交史》、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王正廷的《中国近代外交概要》等著作，但其体例框架尚嫌粗糙。《辑要》上中两卷，按照重要事件的发展线索，对资料分类排序，其纲目俨然如同一部外交史。全书两卷共十三章，依次记述了鸦片战争、战后外交、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攫取我国领土、同治新政、新约和修约交涉、教案、边疆危机与藩属问题、伊犁问题、越南问题和中法战争、朝鲜问题和中日甲午战争等，揭示了中外关系的重大事件。各章析为数节，分列更为具体详细的条目，提纲挈领，条理明晰。章节的整体设置，宏观与微观结合，既勾勒

了近代外交史的大体历程，又揭示了为人们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其编纂体例亦有新创，如各章节几乎都撰有“引论”，以评介该部分资料，或直陈己见，或提示一二；或简述大意，或略叙过程；或设问置疑，或拨雾引路。通过这些“引论”，不仅将零散的资料粘合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导引读者分析思考，可谓用心深密。又如，《辑要》对外国人名、地名译文标注原字，对中国历史纪年也均附以公元纪年，读者用起来很方便，亦为人所称道。

更重要的是，蒋廷黻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在《辑要》自序中阐述了如何治外交史的主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研究外交史就是研究历史，与办外交、做宣传不同，必须“注重历史的数据”，要从“原料”下手。外交史的特别之处，在于与各国相互关联的国际性，因此必须搜集相关各方的资料，不能仅根据一国文献，“专听一面之词”。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论著，不论中外学者，均是以英国蓝皮书为主要资料，颇多片面之处。有鉴于此，蒋廷黻多年来致力于挖掘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冀改变这一状况。《辑要》的编纂出版，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资料本身，而且有助于扭转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偏差。二是编辑此书不是出于政治需要，其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在蒋廷黻编辑此书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正在开展反帝废约运动，有关外交史的论著多服从于这一需要，缺乏扎实细致的学术研究。蒋廷黻特地说明，编辑此书，“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他的目的，是要历史地分析近代外交及其相关问题，将其真正纳入到学术的范畴，并希望读者通过此书“能对中国外交史作一进步的研究”。为此，蒋廷黻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溯源探微，析谬求真，以奠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学术基础。

正是出于学术追求，蒋廷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探寻，力图揭示近代外交的历史真相。各章节的“引论”，实际上表述了蒋廷黻对近代外交问题的学术见解，其论犀利透彻、引人深思，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因，蒋廷黻从战前中英双方的交涉和冲突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由于商业的发展，“急切图求改良”中国的通商制度，而清政府则视此“天经地义，丝毫不可更改”，这是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清政府早期的外交观念，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剖析。如描述琦善在交涉中好“磨难”，这是一种“小商店讲价式的外交”。清政府的谈判官员，由于“尚无主权的观念，不过求办事的便宜而已”，轻易地给对方以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条约权利。这些官员并不认为“有害国权，反以为便，以为有协定的关税，争执就可以免了”。关于晚清外交人物的评判，指出：无论如何“昏庸”两字不能作道咸人物的头衔。他们的外交诚有可批评之处，但其毛病不在于不抵抗，更不在于有心卖国，而在于不明世界大势，不知道国际公法中的主权，以及国际通商的经济利害，因此“争了不应当争的而放弃了所应当争的”。他们也有可取之处，如伊里布和耆英“颇具政治家的眼光”，何桂清的见解甚至是“超时代的”。同光人物对世界大局虽然只有一知半解，而他们的主张及其理论的根据也有“独到之处”。这些人的前辈和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那更不要说了。“李是这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能与他比？”对这些人物的评判，蒋廷黻不是用后人或现代的眼光和价值标准，而是将他们置于所处时代来剖析，充分、具体地体现了“历史化”和“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蒋廷黻通过对所辑资料的整体透视，更进一步发现近代外交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

如，他认为，“根本的困难在中国不愿更进一步的加入国际的生活”，而“西人则无论如何不得让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国人尚不图在国际生活中求出路，换句话说，求平等及进步，反想在国际团体之外求孤立的虚荣和闭关的安逸”。这是中国外交的“大毛病”，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我们一方面须承认这个毛病的自然，同时另一方面须看清这个毛病的代价之大”。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很多便是为这种传统的观念所误。与此相应，他一再提示，从辑录的资料中可以发现，传统的“体制”“破坏我们的外交”，“阻碍了我们外交的进行”；或者说，中国外交为“体制”所误。再如，《辑要》中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外交与文化的关系。蒋廷黻认为，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外交，“不但因为各国所处的地位不同，还因为各国有其文化的特殊传统”。如果仅仅将外交史的资料限于条约、换文及照会，“未免太肤浅了”。如果以为办外交只须知道国际公法，“也是把外交看的太容易了”。中国办了近百年的外交，研究外交史也将近 70 年，但“似乎还未了解外交与文化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分析中日关系，正是由于日本有所谓“大和民族的使命”这一文化信条的背景，所以中日问题才这样严重。

显然，不论是在基础资料的准备，还是在研究方式的革新和学术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蒋廷黻编纂的这部《辑要》，对中国近代外交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建立，有着筚路蓝缕开基创业之功绩。费正清认为他对晚清中外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① 吴相湘说：可以由此“入门以深究中外关系史”，“明瞭过去外交得失的

^① 郭廷主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序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年版。

真相”；^① 李敖称誉他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② 尽管蒋廷黻没有撰写一部外交史，但却通过《辑要》的编纂和相关论文的撰写，形成了自己独成一格的体系，如果将书中“引论”组合成章，不啻是一篇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晚清外交史的导论。再者，中国近代是以中外关系为轴心展开其历史画卷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枢纽。蒋廷黻深悉这一窍要所在，从研究外交史及整理相关资料着手探析近代史，几年后又以《辑要》为基础，写出了简短扼要、精辟独到，且影响深远，至今仍给人们以启发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计划另写一部在中国学术界奠定“永久地位”近百年中国史，却未料到，这部 5 万余字，思人之所未思，发人之所未发的“初步报告”，在今天仍为人们所垂顾，多家出版社再次重版，与《辑要》一道成为传世之作，其学术地位已为史界所肯定。如郭廷以谓，蒋廷黻“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上的重要与崇高地位是中外学者所公认的，他的贡献与影响，很少人可与相比”。他“开其风气”，“为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奠立了一个新基础，使这门学问真正的科学化”。^③

无可讳言，《辑要》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局限。该书表达的学术观点，有不尽完善或偏颇之处；或因囿于自己的编辑思路和学术倾向，在资料选材方面有所偏重而不免忽略其他，以致有损体系的完整；又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化”和“学术化”，淡化中国社

① 吴相湘：《蒋廷黻的“惊人研究”》，《蒋廷黻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李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李敖全集》，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版，第 83 页。

③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例言，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郭廷主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序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 年版。

会反帝废约政治诉求的急迫需要，有意无意地将史学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功能对立起来，割裂了两者所应有的联系。此外，书中还存在着外国人名、地名和时间标注上的某些错误。不过，必须看到，在近代外交史研究刚刚起步的那个时代，资料严重缺乏，人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亦受到极大的限制，又兼蒋廷黻所受教育的特殊背景，诸如此类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如此，也尽管此后外交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拓展、深化，《辑要》阐发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倡导的新的研究方法，及其颇具匠心的资料辑选和编纂体例，仍有着颇堪借鉴和引用的重要价值。

凡 例

一、本书所录的上谕和信札均载发出的年月日。奏折注“发”字者表明其年月日是拜发的年月日，无“发”字者则是奉朱批的年月日。书“又奏”表明年月日与前折同。全书括号内的年月日均是西历的。

二、外人姓名及外国地名皆在括号内注明原字，其译名则照旧。

三、奏折的首尾都是官样文章，本书概不录。此外有删节处则注“上略”“中略”“下略”字样。

四、各节的引论不过说明背景及间加批评。有些章节无须介绍的则不备引论。